

台灣女性主義批評三波論

邱子修（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本篇論文探討在西方三波女性主義的漣漪效應下，台灣女性主義批評雖非同步或照單橫向的移植，但若以此三波中所強調的女權、女性自主意識、到超越性別認同政治的分野來論，卻也依稀可辨識出類似的演變。筆者認為國民黨接管台灣後，不但宣揚傳統父權體制的孔儒思想，並且頒佈戒嚴法，嚴禁言論出版自由，推行以北京話為國語的教育政策，因此以日文書寫的台灣文學、批評、歷史等都遭打入冷宮，以至於一般學者總以為台灣女性主義始於 1970 年代呂秀蓮所倡導的「新女性主義」，而忽略日據時期即曾有過的婦運及女性主義批評的雛形。此外，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在西方盛行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雖然未能在台造成氣候，但 1980 年代還是有李元貞等創辦《婦女新知》雜誌、推動婦運並鼓吹女性自覺所掀起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批評。解嚴後，隨著歸國學人陸續移植西方第二波激進的性自主和第三波多元的女性主義批評，致使台灣第三波女性主義的批評在二十世紀末即與國際接軌，並有頗為同步的發展。本文也將剖析引人爭議的第三波，並對台灣未來女性主義批評或女性研究的方向提出建議。

關鍵詞：西方三波女性主義批評、台灣三波女性主義批評、超越認同政治、跨文化視野

一、前言

雖然台灣婦運和女性主義在二十世紀前半段似乎蟄伏不見動靜，但女性主義從 1970 年代起在質與量上即持續增長蛻變。復因 1987 年的解嚴，政經與文化氛圍鬆綁後，婦運、女性主義批評與論述急起直追的腳步令人刮目相看。除了已有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耙梳不同時期台灣婦運的發展（楊翠，1993；王雅各，1999），也有學者引介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及其在地的吸納（顧燕翎主編，2000），或從女性主義觀點耙梳自戰後到世紀末女性文學反映思潮的演變（Chang, 1990: 15-25）。儘管嚴格說，台灣似乎還沒有獨樹一幟的本土女性主義理論，因此有些學者甚至質疑台灣是否有所謂的三波女性主義。但在西方女性主義三波漣漪效應的衝擊下，台灣雖談不上完全同步發展，類似三階段女性主義的演變仍有跡可尋。因此，本文嘗試耙梳台灣女性主義的三波演變，針對頗受爭議的第三波，探討在台灣歷史文化脈絡下接收所產生的歧異，並對未來女性研究方向提出些建議。

首先得釐清的是，雖然「feminism」（女性主義）一詞最早出現於 1890 年，但「女性抵抗父權體制的意識」更早前就有了（林志忠譯〔Selden and Widdowson, 1997〕，2005）。一般論及西方三波女性主義時，總將第一波視為主要爭取婦女政經平權的婦運，第二波則轉為顛覆父權文化意識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和理論，再到第三波針對某些女性主義批評和理論的反彈或辯證，而主張跨越性別認同的女性主義論述。此外，學術界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或論述，並不同婦運或學運；前者傾向以女性主義的角度，詮釋與文學批評、闡述相關

致謝辭：非常感謝匿名評審寶貴的修改意見。

的理論或性別政治的文化論述，後者強調社會改革或爭取女權的落實。有時彼此雖具共時性的理念重疊、影響，但不同婦運組織、女性主義理論流派、或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或說女性主義批評）的目標與運作也可能大不相同（顧燕翎，2000）。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會以複數和多元來檢視其彼此間影響、交織、互動的發展（Krolkke and Sorensen, 2006）。再者，所謂三波的分法也常見仁見智。¹ 由於專業與篇幅的考量，本文企圖聚焦於耙梳西方與台灣學術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性別政治論述的發展。但論及第一波時難免得涉及相關婦運的概述，而論及第三波時也不得不涉及女性主義理論的流派及相關辯證的論述。

二、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三波論

根據塞爾登（Raman Selden）等人的分法（林志忠譯〔Selden and Widdowson, 1997〕，2005: 125），在第一波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最具影響力的乃是英國女作家吳爾芙（Woolf, 1929）的《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以及法國作家西蒙波娃（Beauvoir, 1949）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受到十九世紀以來爭取政治、社會參與及工作權的婦運影響，這兩本著作進一步質疑傳統男女社經地位、受教權及自主空間的不平等。前者提出女性經濟獨立、寫作空間、雌雄同體的思維乃女性致力於文學所不可或缺，後者則指出

1 有關西方女性主義發展或女性主義批評三波論的說法不一，前者如米雷特（Millett, 1970）、蕭華特（Shawalter, 1982）、莫伊（Moi, 1988）等，以不同角度切入而有不同時期的分界，後者如塞爾登（Selden, 2005）及畢斯理（Beasley, 1999）等，也提出不同的女性主義批評三波論。

女人不應在生、心理上自甘處於父權社會建構下從屬的她者。

第二波女性主義批評受到上述思潮的影響，復在 1960 年代美國陸續興起相關學運與民運的衝擊下而成形（簡瑛瑛，2001: 13）。主要批撻女性不僅在政經社會上、甚且在文學批評及文化意識形態上的不平等。除了延續深受新馬克思社會主義影響的激進派和以中產階級為考量的自由派女性主義，第二波的特色在於將女性主義理論化，建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加入扭轉文化思潮的學術能量，以全盤顛覆傳統父權文化的思維及體制為目標。弗里丹（Friedan, 1963）的《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首開其端，主張女性無酬的家管乃是男女物質不平等的源頭，強調「再生產的政治、女性經驗、性別差異與性徵」（林志忠譯，〔Selden and Widdowson, 1997〕2005: 163）。不久，米雷特（Millet, 1970）的《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以聞名的英國小說家勞倫斯（Lawrence, 1928）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和法國米勒（Miller, 1965）的《性》（*Sexus*）等為例，佐證文學中性／別的操作，之後性／別政治議題立即浮上檯面，掀起學界的論戰。她一反依循男性權威的解讀，以女性讀者閱讀的角度，適時地將女性主義理論運用於文學批評，不但鼓吹文學批評應強調女性解放、性自主，復因當時左派反越戰、反種族歧視和反權威的聲浪，也批判一向自認為有合法論述、充滿男性獨尊意識形態的文學及批評，女性主義文學史的建構與批評遂如過江之鯽。女性主義批評陸續融合各種新銳理論，漸成學術主流的一支，掀起「性別政治」的辯證（林志忠譯〔Selden and Widdowson, 1997〕，2005: 171）。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波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已呈現因應不同時空與理論的辯證。大西洋兩岸女性主義批評的對話時相交貫。有重讀吳

爾芙而將其逐出女性主義批評、並標榜女性經驗及性別差異的美國學者蕭華特 (Shawalter, 1982)，以「女性批評」(gynocriticism) 和女性美學 (female aesthetics) 為第二波推波助瀾，席捲北美。一時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陣營，以拒絕男性介入的姿態捍衛其新領域，而使女性文史指揮官得以重寫女史、女書及女人的豐功偉績，叱吒風雲一、二十年。其實，以女性經驗書寫和性自主的論述並非始于蕭華特，而是以法國巴赫汀 (M. M. Bakhtin) 的對話論和拉康 (J. Lacan) 的心理語言分析為基礎，延伸探討以女性作為言說主體 (speaking subject)、而與父權體制抗衡的對話。1970 年代就有《女性書寫雜誌》，收錄西克蘇 (H. Cixous)、伊希嘉黑 (L. Irigaray) 和克莉斯提娃 (J. Kristeva) 等不同流派的法國女性主義批評。稍後，受到德希達 (J. Derrida) 解構理論的衝擊，莫伊 (Moi, 1988) 以《性別／文本政治》(*Sex/textual Politics*) 反詰蕭華特的「女性批評」乃「換湯不換藥」的理道中心論 (logocentrism)，而宣揚吳爾芙「雌雄同體詩學」(androgynist poetics) 的後現代性。² 賈汀 (Jardine, 1985) 復以「女性創世紀」(gynesis) 主張應以無分性別的女性主義來分析文本。社會／馬克思女性主義批評家，如卡普藍 (Kaplan, 1986)、巴瑞特 (Barrett, 1980) 等，也批判米雷特「放諸四海皆準的陽具論」，不應化約「所有階級的男性都用它來鞭打女性」(林志忠譯 [Selden and Widdowson, 1997]，2005: 168-9)。

無怪乎到了第三波，女性主義批評與理論的分界及流派更為分歧、多元，而且轉向女性主義不同世代、領域、族裔的文化論述及辯證，不再只是女性主義文學的批評。此趨向大致始於女同性戀者維迪

2 「雌雄同體」(androgyny) 一詞乃挪用自布盧姆斯伯里 (Bloomsbury) 的性別倫理 (林志忠譯 [Selden and Widdowson, 1997]，2005: 160)。

格 (Wittig, 1992) 在其《非同性戀心智》(*The Straight Mind*) 揭露異性戀乃另一性別意識形態的偏見 (林志忠譯 [Selden and Widdowson, 1997], 2005: 317)。巴特勒 (Butler, 1992) 更提出「酷兒理論」(queer theory), 反對任何性別認同政治, 而以性別展演、抗衡主流的邊緣自居。在第二波女性主義頗為高漲的文化氛圍下長大的新生代, 也陸續加入反詰以女性為中心的批評。於是, 暗流洶湧的「同志」、「酷兒」交相衝擊, 至今仍漣波蕩漾。如此看似女性主義旗下彼此倒戈相向的批判, 也逼得蕭華特在 1991 年辯駁時代的不同與文化的蛻變才是彼此爭議的盲點所在。若非第二波女性主義在 60 到 80 年代以重新發掘女性經驗、建構女史、女性書寫為職志, 就不會有 90 年代以降視男女平等為理所當然的心態。此外, 由於薩伊德 (E. Said)、巴巴 (H. Bhabha)、史碧娃克 (G. C. Spivak) 等後殖民學者接二連三地揭露歐裔中心論自以為是的文化優越心態, 美洲、東方和南半球的其他族裔, 也日漸浮現不願再屈居西方文化霸權論述下的「從屬者」、而反擊以歐裔中產階級女性為中心的女性主義批評與理論。加拿大的全球女性主義論者邁爾斯 (Miles, 1996) 即提出應從「第一世界」延伸到非只「第三世界」、而是「三分之二世界」的《整合型女性主義論》(*Integrative Feminisms*),³ 掀起多向循環／迴轉結合種族、性別、階層的文化認同批評浪潮。因此, 在二十世紀末嘉年華會似「性／道德無政府」的社會氛圍下, 有關女性主義

3 根據邁爾斯的註解, 第三世界指所有曾經或仍被西方資本帝國殖民的政治／文化地域。她解釋在二十世紀末的學術會議中, 因常聽到「三分之二世界」(Two-Thirds World) 的新說法, 故以新詞代之。她說這樣可以讓北美讀者有較正確的全球觀, 因這個說法更正確地呈現出原所謂的第三世界在現今全世界人口和面積佔有多過一半比率的事實。詳見 Miles, 1996: 148。

批評的焦點，遂從性／別（不平等）政治，逐漸邁向批判帶有政治（操控）色彩的性／別論述。前者意在鞭撻父權社會中男性的操控意識，高呼女性自主的覺醒，後者則著重在揭露女性主義抬頭後，改以女性為中心所建構類似男性霸權論述的迷思，同時也反擊西方慣以歐裔為中心的意識形態，並質疑全球化乃第一世界跨國資本集團以科技傳播媒體的壟斷所建立起的文化帝國主義，而提出「抵三重殖民」（de-triple colonialism）的論述（Morley, 2006: 30-43）。無怪乎超越性別認同政治的主張也日漸浮現，以便能擴大關懷同是深受剝削的中、下社會階層及非歐裔族群的論述。前者如莫菲（Murphy, 1995）於1995年出版的《跨越女性主義》（*Beyond Feminism*），後者如洛德（Lloyd, 2005）的《跨越認同政治》（*Beyond Identity Politics*）。她們都主張以內省批判的態度，不斷檢視、修正帶有偏見的女性主義批評，並以包容、協商的態度來尊重因彼此文化不同而導致的歧異立場。

三、台灣女性主義批評的三波論

一般學者都以呂秀蓮1970年代初所倡導的「新女性主義」為台灣女性主義的開端。但根據後來日漸增多的學者——如楊翠（1993）、施叔青和蔡秀女（1999）等——對台灣本地曾被禁刊或遺忘的軼史、傳說、文學或報章的研究，台灣的女權啟蒙，其實可遠溯至來台傳教的加拿大長老會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牧師在1883年首先創建的淡水女校。由於它的成立，造就了台灣第一位婦產科女醫師蔡阿信（施叔青、蔡秀女，1999）。她不但以醫術高明、自辦「產婆養成研習會」長達十年而頗具社會聲望，還在婦女解放意

識萌芽中扮演進步女性的重要角色（楊翠，1993：499, 505）。此外，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也有報章雜誌——如初創於日本、在1927年獲准於島內發行的《台灣民報》——鼓吹各種婦女解放運動，包括男女平等、女性受教權和廢娼制等。楊翠以分析從1920到1932年的《台灣民報》來闡述當時的台灣婦運。她指出1921年彭華英在《台灣青年》發表第一篇婦解言論後，陸續就有文字或演說鼓吹，促使婦解意識萌芽，催生了台灣第一個本土婦女團體——「彰化婦女共勵會」。但由於歷史情境使然，台灣婦解常與民族及無產階級解放相提並論，而且總被置於兩者之後。此外，「很多婦解言論是間接（透過日本、中國）從西方移植的」，以至於台灣女性已然遭受「『資本家——殖民者——父權』的三重支配」（楊翠，1993：8, 21）。因此，楊翠認為這一階段的婦運僅促成「解纏足」與官方認可的婦女團體的成立，兩者卻不見得落實女性解放。

在如此「三重支配」的文化思維籠罩下，理應不會有如西方女性作家公開主張質疑父權的女性主義文學或批評。不過，當1929年吳爾芙書寫女人應「使自己成為自己，比什麼都重要」（張秀亞譯〔Woolf, 1992〕，2000：185）時，1942年楊千鶴也在高畢後，不甘立即結婚生子，而發表「相當認真地在找尋自我，在自我的世界裡徘徊思索」，並「渴望能靜一靜，有喘息的時間與空間，來了解自己，好好審視自己」的感言（林智美譯〔楊千鶴，1942〕，2000：9, 11）。文中所謂「在『沿襲古風』與『趨向新世代』的夾縫中，受到兩者之間的一層強烈的摩擦力所羈絆、網套的『自我意識』」（林智美譯〔楊千鶴，1942〕，2000：15, 19），其實指的就是「女性自主意識」。因此，不同於一般女孩認命地聽從父言，嫁作人婦，她決意先工作。當她發現與日人同工卻不同酬時，即憤而辭職。復以曾哀傷痛哭慈母逝世的

親身經驗，在《文藝台灣》發表一篇題為〈哭婆〉的隨筆，反駁日人在前期題為〈芳蘭〉的文章中，以種族優越心態譏評台灣當地送葬民俗，而獲得日籍編輯西窗滿的賞識，遴選為台灣第一位女記者，並據理力爭，獲得與日人同樣的待遇（施叔青、蔡秀女，1999: 37）。換言之，她勇於批判日人文學批評中潛藏殖民母國的文化優越意識形態，頗類似史碧娃克批撻西方的優越意識形態，而她爭取女權同工同酬的勇氣，在在呈現出相當前進的女性主義思想及批判精神。因此，論者不應予以輕忽，而自認國民黨執政前，台灣女性主義批評就僅一片空白。

如是空白的想法，應歸因於 1945 年國民黨從戰敗的日本接管台灣後，不但宣揚傳統父權體制的孔儒思想，並且頒佈戒嚴法，嚴禁言論出版自由，推行以北京話為國語的教育政策。以日文書寫的文學、批評、歷史等都遭打入冷宮，自然就沒有人知曉楊千鶴的女性主義思想或文學批評。此外，許多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如自由派、激進派、馬克思社會主義，以及與其國策有所抵觸的言論、書籍都禁止公開散佈。是以，嚴格說，在 1987 年解嚴以前，歐美的第二波女性主義並未在島內造成氣候，但仍因留美時親臨過第二波洗禮、陸續歸國的台灣女性學者，在不獲好評的艱困下持續推動，而留下移植的在地痕跡。呂秀蓮在 1971 年出版的《新女性主義》中提出「先做人，後做女人」，一時傳頌於世（呂秀蓮，1990）。雖然她曾因參與高雄美麗島事件而身陷囹圄，但出獄後仍積極為女性爭取社會權利及政治參與。難怪一般都以她為推動台灣婦女運動的創始人（王雅各，1999: 23）。但就楊翠所發掘的史料來看，日據時期台灣婦運已播下種籽，也有楊千鶴爭取同工同酬、批判日人文化優越的意識形態。呂秀蓮應算是第一位以「女性主義」旗幟，為女權運動掀起較為引人注目的波

瀾，因為這一波的婦運也不乏類似 1920 年代得經由官方認可的婦女團體應變的權宜作風，有些甚至流露出不自覺的輸誠情結（王雅各，1999: 23）。郭良蕙的《心鎖》在 1963 年遭女性作家譴責，並被中國婦女寫作協會開除會籍，並非事出無因。

即便如此，從 1982 年到 1987 年間，還是有主張自由派女性主義的學者如李元貞等，不畏人言地出版雜誌《覺醒》，呼籲女性自主意識，重視女性經驗。新銳女作家都或多或少受其影響，相對地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也日漸增多，而形成台灣第二波女性主義批評。雖然解嚴前在孔儒教化下成長的女性大多傾向保守，大多不願以女性主義者自居，或露骨地涉及性別政治議題，但其中的小說家李昂，最具有對文化思潮變動的敏銳反思力，是以她的小說主題能隨著時代而不斷蛻變，呈現出西潮東漸的第二波女性主義在台灣小說界掀起後浪推前浪的漣漪效應。因此，有關其小說的文學批評，不少是從篩選過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切入探討的女性主義批評。但因仍在戒嚴時期，她們猶如新葛蘭西文化霸權論述中的有機知識份子，在國家機器的操控下不得不作策略性的妥協，以換取社會民心一時的安定。⁴

一直要到 1987 年解嚴後，政治漸趨民主開放，西方第二波的自由、激進派和第三波的批評與論述才接二連三地湧入。陸續留學歸國的女性學者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面，先有鍾玲於 1989 年出版《現代中國繆司——臺灣女詩人作品析論》，企圖顛覆陽具中心語言思考的詩學。隨之有 1990 年張頌聖耙梳戰後以降的台灣女性小說，從發抒個人情愛及描摹傳統女性受壓迫掙扎的閩秀溫和派，歷經西方現代文學洗禮而追尋自我的中生代，到世紀末嘉

4 有關新葛蘭西文化霸權論述，詳見李根芳、周素鳳譯（〔Storey, 2000〕，2003: 182）。

年華會式的激進派來闡述其演變。接著，援引歐美自由派女性主義、鼓吹女性性自主的論調也一時水漲船高。何春蕤繼《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1994）大聲疾呼「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後，復以《〈豪爽女人〉誰不爽》（1997）中看似「性解放福音」、卻是「想像／浪漫化的女性性好／豪爽」來倡導女性性自主。而以張小虹為首，引進酷兒理論於 90 年代同志文學的批評也名噪一時，成為反父權、反權威、反主流的精英文學青年琅琅上口的術語。其間，也不乏男性學者如王德威、陳芳明、邱彥彬等以歷史為參照的女性主義批評，或如廖朝陽、廖咸浩等以解構／後現代主義分析女性作家如何顛覆父權社會的女性主義批評。

然而，拜 1987 年解嚴前的兩道防波堤所賜，60 年代到 80 年代在西方盛行的第二波女性主義，並未全面登陸台灣而孕育出徹底翻轉傳統的文化氛圍，台灣普遍還是處於以國家為重而由男性掌控的時代。換言之，在 90 年代前，尚未有如西方在第二波女性主義下養成的新生代，因此也就沒有如西方新生代對第二波某些權威女性不自覺「以女性為中心論」的反彈。在台灣若有類似的反彈，或應指的是針對世紀末嘉年華會下「性／道德無政府」式的豪放狂歡，批判其枉顧歷史文化脈絡而草率移植西方女性主義的論述。兩者雖不全然在理論上雷同，但揭露其不自覺地以自我為中心展演操作的意識形態，卻是異曲同工。

舉例說，陳麗芬即觀察到 90 年代的台灣文學，性話語已「從一個原不可說、不該說的私人隱密層次，漸漸轉化升級為文化語言」（1996: 173-183）。她以李元貞（1992）的《愛情私語》為例，闡述其以女性主義之名，卻不自覺地反映了弔詭的台灣後殖民處境。原為依循西方性覺醒文學的成長小說，因以留美生活為背景，讓離過婚、

經驗豐富的美國中年男子作為女主角性知識的啟蒙，而後女主角轉以其新發現的性權力，實踐於學術位階不如她的台灣同胞小張身上；陳麗芬批評：「李元貞對女性主體的想像，根本建基於以男性為中心的制式價值觀上。這女性自我是透過性慾來定義的」（175）。她也指出女主角的塑造不但「自我東方化」、「性論述」被等同「現代化」、還「表現了後現代混雜的國際與本土的性格」（176）。雖然陳氏如此解讀，也不無將文本抽離其原有文化脈絡、而強置於後殖民論述之嫌，但類似「性愛神話」確實也如其所言，「成為今日台灣消費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它已成為一企業」（177）。此一第三波女性主義支流的發展，正與西方同步，淪為消費市場的噱頭。

劉亮雅也質疑另一位精英學院派的女性主義者張小虹後現代式的「酷兒展演」作風（Liu, 2005: 123-153）。她認為張小虹將酷兒理論以反叛不羈的瀟灑姿態吸引年輕人，卻不見得真正在乎台灣同性戀依舊邊緣化的弱勢情境。如同何春蕤移植的性解放論述一時深受大學生及中產階級女性歡迎，張小虹所出版的《性別越界》（1995）和《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1996）也常被引用為新時代年輕人的前衛口頭禪。然而，根據劉亮雅（Liu, 2005）的分析，台灣的後現代女性主義和酷兒理論幾乎是同時引進發展的。以至於移植到台灣的理論，不同於原本在西方社會文化脈絡下循序漸進的發展。例如在島內移植時，並沒有類似西方、在歷史文化脈絡發展下可供批撻和反彈的女性霸權對象。之所以能移植成功，造成熱烈迴響，乃全歸因於當時以民主為口號、聲勢高漲的反權威、反主流的前衛氣焰，加之以媒體的造勢，使得有關單位因預見各自有利之遠景而積極參與、推波助瀾。換言之，有些論者似乎也將原來追求兩性平等的性／別政治，轉成漸帶有展演式的政治化性／別論述。

另一方面，因 80 年代起中國改採對外開放的政經策略，但在國際政壇上刻意打壓排擠台灣，致使島內逐漸滋長的本土意識更為茁壯。解嚴後，不同族裔的女性遂在 90 年代，以打造不同族裔認同、重構台灣或女性自主性為目標，因而也與百花齊放的西方第三波女性主義結合後殖民的論述接軌。從後殖民角度，解讀台灣女性文學中以女性自主寓言抵殖民的精神，成為女性主義批評的主流論述。邱貴芬、劉毓秀、彭小研、林芳玫等即對李昂《迷園》中女主角追求性自主的過程，視為企圖建構台灣主體性的國族寓言。在《仲介台灣·女人》中，邱貴芬（1997）進一步分析不同族裔的女性小說中所流露出性／別文化認同的歧異。排灣族原住民利格拉樂·阿鄔（1998: 56）即曾批評都會精英女性主義者自以為是的化約代言，以所謂「樓上樓下」影射某些女性始終遭定位在下層邊緣意識的社會現實。

不少學者也留意到全球化的衝擊，而再思台灣的文化認同議題。邱貴芬（2003）以《後殖民及其外》企圖為女性主義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角力、國家機器與民族意識的夾縫中，尋找容身之地。她雖然指出，論述權力的運作與複雜多變的歷史文化脈絡有不可切割的因果關係，但也憂心結合後殖民與女性議題，有可能在國家主義看似名正言順的大敘事下，繼續邊緣化女性之實。再者，台灣雖自 1994 年起已企圖透過教改來落實多元文化，但仍有不少學者如劉亮雅（2006: 61-84）等質疑，在後現代與後殖民的並置、交織、角力下，殖民遺毒是否已根除？她以不同創傷記憶理論結合後殖民的角度切入，分別闡述陳燁、李昂、朱天心和施叔青小說中融合後現代、後殖民及女性主義的文學批評。換言之，台灣女性主義批評發展至此，似乎也呈現出第三波的跡象：企圖超越以某一族裔為中心或跨越僅以中產階級為考量的女性主義，而擴張到關懷弱勢族群／階層。

四、未來女性研究的方向

由於歷經解構主義去中心及後現代主義對理性和完全自主性的存疑，因此，不同於第一波女性主義重在爭取女權、第二波強調建構女性自主書寫與批評，第三波女性主義呈現出女性經由不斷對話、抗衡、蛻變，而產生多元、多重混雜的認同（multiple and hybrid identities）或相對自主性（relative subjectivities）的認可。雖然這一波並非齊一單向的洶湧，但其主要抵「理道中心主義」（logocentrism）、抵殖民、抵「女性中心主義」（gynocentrism）、抵「歐裔中心主義」（Eurocentrism）、抵任何「族裔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甚至超越性別認同政治的特色卻不難辨識。因此，最近第三波女性主義批評或所謂後女性主義之說，遂有改以「女性研究」（women studies）、甚至所謂「男性研究」（men studies）等詞來呈現超越性別認同政治的新方向或相對的辯證發展。

然而，第三波的流弊乃在於一片後現代反傳統、反中心、反主流的聲浪下，讓很多人誤以為所有的道德倫理全都是社會文化建構下過時的迷思，可以一概棄之不顧。而各種以自身利益為重的少數他者，藉機紛紛要求其權利而不談相對義務責任的火爆氣焰，也如野火蔓延，一時四處熊熊烈火，令人觸目驚心。正如莫非所言，後現代的戲擬展演與酷兒為反對而反對的極端也將如昨日黃花。因此，在燒盡頹廢的瓊宮殿宇後，重建的工作仍應以大多數人的福祉為依歸，以經由跨文化的對話、溝通、了解、凝聚共識後所建構的道德為準則，而整合成一和諧、不斷蛻變、全方位兼顧的生態環境（a holistic eco-environment）。

雖然在特定的社會文化氛圍下，不同的族裔社群確實有看似無

法共存、相容的矛盾存在，但不少女性主義學者已指出，當我們能超越褊狹、自我為中心的認同政治後，還是能付諸實踐（Weeks, 1998: 2-7; Squires, 1999: 2; Lloyd, 2005）。此外，儘管神學的權威已大不如前，但從去中心後的哲學及融合各種宗教觀點切入的女性主義道德論述（feminist ethics），也如另一股清泉，尋求可能的匯集，一同力挽狂瀾，為自世紀末嘉年華會以來，性／道德無政府的混亂局勢另闢新徑。例如北美法律教授寇柯（Colker, 1988）結合東、西神學，倡導一種不斷經由靜坐冥思和與他人溝通對話來修煉無我（non-self），以至於能具現博愛、慈悲和智慧的女性主義泛宗教式的倫理概念。而以女性主義觀點所改寫的天主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義，甚至不具任何僧尼階層的女性主義的女神禱告儀式（feminist goddess worship），也在加拿大日漸普遍（Stuckey, 2001）。換言之，最近西方學術界逐漸興起女性主義宗教（Feminist theology）、女性主義倫理（Feminist ethics）或生態女性主義的批評論述，作為「後女性主義」的另類選擇。反觀台灣，結合女性主義神學、倫理、生態與環保的女性主義批評也陸續有學者研究論述。根據盧蕙馨（2000）的研究，證嚴法師致力將大乘佛教入世化，不分種族、性別、階層，跨越國界，並把環保意識等理念付諸實踐。在耙梳西方對於正義倫理的學術辯證後，簡成熙（2000: 189）以台灣平地之於山地的訪談結果，主張應捨棄帶有排他性的女性主義批評，而以「關懷倫理」來整合正義的研究、論述。紀駿傑（2003）也認為晚近具有經濟與社會文化變遷觀點的生態女性主義，已非二元論的本質主義，而是試圖解放物種與性別壓迫，致力於全球環保。

的確，任何主張破除剝削、壓榨的義正詞嚴之論，都有可能落入不自覺地以自我為中心、或為圖己利的挪用變質。因此，未來女性

議題的研究，應該繼續朝向超越性別、甚至自我為中心的修養論述發展。再者，以全球觀、跨文化的視野，探討如何結合宗教、關懷倫理、生態和環保，以落實超越狹隘認同政治的願景，也將是刻不容緩的方向。因為，如果我們不能將邁爾斯所提「三分之二的世界」認真列入考量，嘗試超越種族、性別、族群、社會階層、年齡，甚至不再以人類為中心的思維及實踐，那麼第三波女性主義批評所標榜多元、多重的認同，也可能在臨近「女性主義的彼岸」(beyond feminism)後，即真消散無蹤。

參考文獻

- 王雅各 (1999) 《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史》。台北：巨流。
- 呂秀蓮 (1990) 《新女性主義》。台北：前衛。
- 何春蕤 (1994) 《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台北：皇冠。
- 何春蕤 (1997) 《呼喚台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台北：元尊文化。
- 李根芳、周素鳳譯 (2003) 《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台北：巨流。譯自 John Storey (2000)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3r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Prentice Hall.
- 李元貞 (1992) 《愛情私語》。台北：自立晚報出版。
- 利格拉樂·阿鄔 (1998) 《穆莉淡 (Mulidan)：部落手札》。台北：女書文化。
- 邱貴芬 (1997) 《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台灣閱讀》。台北：元尊文化。
- 邱貴芬 (2003) 《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
- 林志忠譯 (2005) 《當代文學理論導讀》。台北：巨流。譯自 R. Selden and P. Widdowson (1997)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and London: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 林智美譯 (2000) 〈花開時節〉，江寶釵、范銘如主編《島嶼蚊聲：台灣女性小說讀本》，4-30。台北：巨流。原作者為楊千鶴，原載於《台灣文學》(1942年7月)，2(3)。
- 施叔青、蔡秀女編 (1999) 《世紀女性·臺灣第一》。台北：麥田。
- 紀駿傑 (2003) 〈生態女性主義：連結性別壓迫與物種壓迫的女性主義觀點〉，《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6: 295-321。

- 陳麗芬 (1996) 〈性話語與主體想像——李元貞愛情私語與李昂迷園〉，鄭振偉編，《女性與文學——女性主義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73-183。
香港：嶺南大學。
- 張秀亞譯 (2000) 《自己的房間》。台北：天培。譯自 Virginia Woolf (1992) *A room of one's ow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楊翠 (1993) 《日據時期台灣婦女的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 (1920-1932)》。台北：時報文化。
- 劉亮雅 (2006) 〈文化翻譯：後現代、後殖民與解嚴以來的台灣文學〉，《中外文學》，34(10): 61-84。
- 盧蕙馨 (2000) 〈現代佛教女性的身體語言與性別重建：以慈濟功德會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8: 275-311。
- 簡瑛瑛 (2001) 〈歐美女性主義與女性文學的表現〉，《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5: 13-20。
- 簡成熙 (2000) 〈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的論辯〉，《教育資料集刊》，25: 185-211。
- 顧燕翎主編 (2000)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
- Barrett, M. (1980)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London: NLB.
- Beasley, C. (1999) *What is feminism? An 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theory*. London: Southern Oaks.
- Beauvoir, S. (1949) *The second sex*. trans. H. M. Parshley (1961). New York: Bantam.
- Butler, J. (1992) *Gender trouble: Feminist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hang, S. Y. (1990) Three generations of Taiwan's 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In A. Carver and S. Y. Chang (Eds.), *Bamboo shoots after the rain: Contemporary stories by women writers of Taiwan* (pp.15-25).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 Colker, R. (1988)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law*.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 Friedan, B. (1963)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Dell.
- Jardine, A. (1985) *Gynesis: Configurations of women in modernity*. Ithaca: Cornell UP.
- Kaplan, C. (1986) *Sea changes: Culture and feminism*. London: Verso.
- Krolkke, C. and Sorensen, A. S. (2006) *Gender communication theories & analyses: from silence to performa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Liu, Liang-ya. (2005) Queer theory and politics in Taiwan: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queerness in and beyond Taiwan lesbian/gay/queer activism. *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4: 123-153.
- Lloyd, M. (2005)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Feminism, power & politics*. London,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
- Miles, A. (1996) *Integrative feminisms building global visions, 1960s-1990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Millett, K. (1970)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 Co., Inc.
- Morley, D. (2006)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Old questions in new guises. In James Curran and David Morley (Eds.) *Media and cultural theory* (pp.30-4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oi, T. (1988)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Co. Ltd.
- Murphy, C. F. (1995) *Beyond feminism: towards a dialogue on difference*.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 Shawalter, E. (Ed.) (1982)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quires, J. (1999) *Gender in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tuckey, J. H. (2001) Women and religion: Female spirituality, feminist theology, and feminist goddess worship. In N. Mandell (Ed.) *Feminist issues: Race, class, and sexuality* (3rd ed., pp. 279-306). Toronto: Prentice Hall.
- Weeks, K. (1998) *Constituting feminist subject*.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ittig, M. (1992) *The straight mind and other essays*.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 Woolf, V. (1929) *A room of one's own*. London: Hogarth Press.

The Three Waves of Feminist Criticism in Taiwan

Tzuhsiu Chiu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criticism in Taiwan owing to the ripple effect of the three waves of 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est. Although not synchronized with or exactly transplanted from the West,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feminist criticism from advocating women's rights movement, to promoting female autonomous consciousness, and to moving beyond dualistic sexual politics is discernable. Due to the promulgated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onfucianism and Martial Law which prohibited Japanese and Taiwanese histories, literatures, and criticisms after the ROC Nationalist Party took over the island, most critics hold that Taiwanese feminism was initiated by Lu Xiulian with her *New Feminism* published in 1971. The embryo of women's rights movement and feminist criticism during the Japanese ruling period has been unfairly ignored. Besides, although the second wave of feminist thoughts in the West during the 60s and the 80s did not completely reach the island and transform the cultural mentalities due to the Martial Law, Li Yuanzhen and others determinedly founded a women organization and published *Awakening* in 1982 to disseminate female consciousness, resulting a similar second wave of feminist criticism on the island. After the Martial Law was lifted in 1987, many scholars with PhDs returned from overseas to Taiwan to teach and transplanted the used-to-

be banned radical and liberal feminisms of the second wave and the new feminist theories of the third wave. Consequently, during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criticism in Taiwan appeared to synchronize with the tempo of global movements of feminist thoughts and criticism. In this paper, not only will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the third-wave feminist criticism be discussed, but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feminist development or gender studies will also be provided.

Keywords: Three waves of 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est, three waves of feminist criticism in Taiwan,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作者簡介

邱子修，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主要教授課程：西方文學理論、文化理論與實踐、台灣文學英譯閱讀、英語研習、女性文學與影像、台灣戲劇欣賞、台灣電影欣賞。

〈聯絡方式〉

地址：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E-mail: tbchiu@ccu.edu.tw